

制造“未来”： 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李静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18.06.005

著名作家叶永烈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文革”结束后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科幻小说，1978年8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据叶永烈统计，“不光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大量印制，许多省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纷纷租型印刷，使这本书一下子印了150万册，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本书还被改编为三种版本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连环画的总印数也达到150万册。所以，《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总印数，达到了300万册。”¹这部仅有7万字的小书之所以如此畅销，“都是因为这本科幻小说‘全景式地展示了21世纪的科技场景’（叶永烈语）。之所以称‘全景式’，是因为《小灵通漫游未来》涉及了航天、航海、医疗、气象、农艺、建筑、交通、通讯、电子、微生物甚至机器人等诸多领域。”²这种全景式的呈现也被后来的研究者形象地称为未来世界的“清明上河图”³。而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幅“清明上河图”越是全面细致，它所叙述的“未来”世界便越是可感、可知、触手可及，越是与每个中国人在“百废待兴”之际的生活诉求息息相关。在逐渐走出“伤痕”时代，准备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情境中，如此美好真切的“未来”叙述也就自然令人神往。现任《科幻世界》副总编的姚海军曾回忆自己对此书“不能自拔”的感情：

那个年代，可能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这本书里五光十色的未来让

1 叶永烈：《写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后》，《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4期。

2 李宁：《难忘“小灵通”——写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25周年之际》，《科学时报》，2003年7月10日。

3 参见《〈小灵通漫游未来〉：它是未来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南方都市报编著：《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8—157页。



我们很憧憬，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希望快点长大创造和见证这样的世界。⁴

这段回忆很有代表性。“文革”结束初期，“过去”被叙述为“蹉跎岁月”，“未来”自然成为了“解药”、出口和希望。姚海军所说的“五光十色的未来”，指的便是书中的记者小灵通在未来市体验到的高科技生活。小灵通在梦境中登上了去往未来市的气垫船，并在未来市市民——同时也是他的同龄人小虎子和小燕——的带领下畅游该市，全面体验了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高科技成果，最后乘坐火箭离开了未来市，写下了这篇“游记”。《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畅销，反映出了时人对于科技必将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仰。美好的未来，也召唤出了他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动力。

以上关于《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畅销

的惯常解释，的确不无道理。可以说，正是对于“未来”的细致勾画构成了本书最强劲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叶永烈又相继创作了《小灵通再游未来》（写作于198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出版）和《小灵通三游未来》（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出版）两部续作。前者创作于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之时，后者则诞生于世纪之交，而这两个时段里的人们对于“未来”同样充满好奇，各式各样的“未来”想象乃至未来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煊赫不已，这两本续作也都及时地提供了具体化的“未来”图景。可是，它们的影响力却远不及《小灵通漫游未来》，再无轰动效应可言。这便不由引人省思：究竟是读者见异思迁，还是在两部续作中延续的与《小灵通漫游未来》相仿的想象模式出了问题？而《小灵通漫游未来》之所以能够畅销，并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其“未来”叙述与时代语境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契合关系？书中那些令人痴迷的“未来”图景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它们又具有哪些特质？

一、“未来”从何处来？

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创作时间其实要早得多。1977年10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邀请叶永烈给小学生上过一堂名为“展望2000年”的科学知识课。此后，他便不断收到以2000年为主题的讲座邀约，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都对2000年表现出了强烈

4 侯大伟、杨枫主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的兴趣。叶永烈曾专门记录了当时一位普通教师的看法：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很想具体地知道未来是怎样美好。孩子们是未来的建设者，他们就更加强烈地向往未来，关心未来。⁵

在此背景下，叶永烈又收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关于《在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的约稿。这促使他回忆起1961年写下的科幻作品《小灵通的奇遇》，而这本旧作正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雏形：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感谢科学春天的到来，这颗被遗弃多年的种子终于萌发了。我把那发黄的书稿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立即得到领导和责任编辑沙孝惠的热情肯定。他们建议把书名改为《小灵通漫游未来》，压缩头、尾，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于是，我重新写了一稿。责任编辑沙孝惠认真编辑，画家杜建国画出了生动活泼的插图，画家简毅设计了精美的封面。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帮助下，这本书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印好，与广大小读者见面了，算是部分回答了他们关于“未来什么样”的问题。⁶

从“奇遇”到“未来”的标题改动，使得此书摆脱了“儿童文学”的限定，其读者群也从少年儿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而且以显豁的方式突出“未来”这一关键词的做法还更加契合了“未来什么样”的时代核心议题。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与快速行动，也显示出了当时回答这一议题的迫切感。



叶永烈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

但如若继续追溯，便会发现《小灵通的奇遇》的底本乃是叶永烈1959年写作的科普书摘《科学珍闻三百条》。《科学珍闻三百条》在1959年虽遭退稿，却为叶永烈写作《小灵通的奇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叶永烈正是在1959年收集的科技新成就与新动态的基础上，将科技成果的“清单”改造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的：

5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创作历程》，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 同上，第360页。

我通过一位眼明耳灵、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行一番漫游，报道种种未来的新科学、新技术。这样一来，抓住了一根贯串线，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起来。另外，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⁷

从中可见，《小灵通的奇遇》赋予了1959年撰写的科技“清单”以内在的有机性和形象性，将抽象的高科技成果的介绍转化成为一种可感的、贴近普通人日常经验的未来生活方式的展示。《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的未来想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1959年总结的科技成果上，只不过时变势易，“旧事”被灌入了新的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科学珍闻三百条》被退稿的同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科学家谈21世纪》一书。如果将《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小灵通的奇遇》（1961）与《科学家谈21世纪》（1959）进行对比，便会发现它们对未来的具体想象极为相似，都偏重于展现无线电、原子能与电子科学等新兴领域的高科技成果，也都是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开叙述的。

“未来”的世界，几乎就等同于高科技的世界。但不应忽略的是，即使运用同样的科技成果来“制造”未来想象，在不同的时代氛围中，也会形成不同的现实期待与未来愿景。具体来说，在1959年的历史语境中，作为“专”的科学技术是第二位的，而政治上的“红”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划和共产主义的远景，才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未来想象，而

具体门类的科学技术不过是达致这个“未来”的工具。前者是“大道”，后者是“小技”。因此不足为奇的便是，翻开《科学家谈21世纪》，首先看到的是统领全书的“大纲大法”——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题辞：

无论做任何事业，都必须有科学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相结合。

科学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要根据事实，根据实践，求得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之后，从而改造客观事物，促进自然和社会的发展。

少年时分养成这种精神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学会作周密的观察、仔细的分析，但也要学会大胆的推想、扼要的综合，从而发挥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既要刻苦学习，也要敢想、敢说、敢做。我们要做实事求是的左派，也就是革命的科学家或科学的革命家。又红又专，红透专深。

少年时分的可塑性很大，学习任何东西都比较容易，而且可以终生不忘。

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少年们是幸福的，廿一世纪属于你们。你们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祝你们进一步征服自然，在向地球开战和向宇宙开战中，获得辉煌的胜利。

郭沫若 一九五九年八月卅一日⁸

郭沫若的题辞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

7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创作历程》，《小灵通漫游未来》，第359页。

8 郭沫若：《题辞》，《科学家谈21世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强调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将这种状态指称为“革命的科学家或科学的革命家。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不过，在当时的“跃进”氛围中，题辞的最终落脚点是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尾处的“向地球开战”和“向宇宙开战”便表现出了面对自然规律时的高昂自信。相较之下，写作《小灵通的奇遇》的1961年，历史情势已经发生变化。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此时对于科学技术与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⁹。换句话说，在“红”与“专”的动态关系中，“专”的重要性得到增强。与《科学家谈21世纪》相比，《小灵通的奇遇》以及此后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不再有题辞这类“大纲大法”，也不再方向性的“表态”，而是将全部笔力用来呈现美好的高科技世界。而这恰好与“文革”后“专”逐渐压倒“红”的意识形态诉求相契合，该书的畅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虽然《科学家谈21世纪》有着“又红又专”的“大纲大法”，但在具体地展望21世纪时，依然是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维度上展开的，所以当该书1979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印后，同样也切合了“未来怎么样”的时代议题，成为了一代人的科学启蒙读物。《小灵通漫游未来》与《科学家谈21世纪》在“文革”后大放异彩，彰显出了科学技术在未来想象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从1959年的《科学珍闻三百条》到1961年的《小灵通的奇遇》，再到1978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一文本序列清晰地表明了《小灵通漫游未来》与“十七年”时期科幻作品的连续性，该作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也对“十七年”时期的同类作品多有借鉴。¹⁰

因此，《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的未来叙述不是“文革”后“从天而降”的新鲜事物，反倒更像是历史仓库中的“存货”。这一携带着“十七年”科幻基因的“时代宠儿”，既延续了既往的创作模式，又开辟了摆脱历史负担的崭新的想象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不只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政治概念。对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的“未来”的理解，便不能离开对于时代语境的体察、对于其间秉持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以及对于“未来”想象背后的整体性的历史—政治视野的考辨。

在20世纪中国，“未来”是最振奋人心的话题之一，无时不刻不在牵引着现实进路

9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一文中指出，从1958年8月起，中共才开始真正认真进行经济建设，主要的目标是向地球开战，改造自然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页）。1959年的毛泽东虽然也认可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实际上更加肯定掌握客观规律后所发挥出的主观能动性。而等到发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时，情况就有了明显变化。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0页）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坦承自己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知识较多，在生产力方面的知识较少。1960年代初，毛泽东曾倡导技术革命，不过在1960年代中后期又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文化革命”。

10 比如，迟叔昌的《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1957）里的现代交通工具、郭以实的《科学世界旅行记》（1958）中的新兴都市“太阳城”等元素，都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有所呈现。而用梦境来表现未来技术，也是“十七年”科幻作品中常见的文本形式。

的选择。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未来”成为社会主义自我证成的关键环节,而社会主义文艺正肩负着提供未来想象的重要使命。故而,对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未来”书写也就别具意义。接下来,本文将从《小灵通漫游未来》推展开去,选取共和国三次想象未来的高潮——“大跃进”时期、“文革”结束初期与世纪之交——作为讨论对象,具体结合《共产主义畅想曲》(1958)、《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小灵通再游未来》(1986)与《小灵通三游未来》(2000)等文本进行分析。勾勒这一文本序列,旨在通过不同时期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与连续性的辩证,考察《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的“未来”是被怎样构造出来的,又具有哪些特质。而从《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一颇具标本意义的文本深挖下去,可以勘测出不同时期的发展观、未来观与科技观的承接转捩,进而更好地理解“文革”后的历史转折的展开逻辑,并反思其中的经验与不足。

二、物质还是精神:“未来”怎样书写?

《科学文艺》1981年第1期上载有萧建亨的《试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一文,文中这样评论“十七年”科幻小说中书写的“未来”: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们对科学幻想小说的要求是:要为工农业服务,要落实到生产上去。后来狂热的共产风又把这种实

用主义的“谨慎”刮得一千二净。于是有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未来,就变成了喝牛奶、吃巧克力、按电钮,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庸俗的“乌托邦”。在这种社会里,由于人人都成了安琪儿,一切矛盾都已解决,幻想当然都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呓语,失去了它那怀疑主义的光芒和色彩。社会既不再有冲突,大自然的改造,就象是在刀刃下的豆腐一样。这样的科学幻想小说当然也成了一种无冲突论的样板……这样的幻想,当然是和生活、和科学都是脱离了十万八千里的,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启发性。实践终于证明:过分功利主义只能扼杀创造性的思想,产生一些平庸的没有生命力的科幻作品。¹¹

萧建亨的总结十分到位,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在这样庸俗的乌托邦里,没有矛盾和冲突,抵达了一个完全静止的、尽善尽美的终点。于是,幻想的空间随之丧失,“怀疑主义的光芒和色彩”也不复存在。无独有偶,不仅在科幻小说创作中,甚至在现实政治规划中,也贯彻了类似的未来观。1958年7月25日,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陈丕显与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穆青便对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的上海做了如下规划:

1.吃的方面,凡是重要的路口,原来设立饭店、点心店、茶水点的地方,早上自动有人把客饭烧好,米饭和几种面食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谁路过的就可以进来吃,看到吃得差不多了,就从旁边的预留的小仓库里拿

¹¹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小灵通漫游未来》插图里描绘的物质极大丰裕的未来

出一些原料来烧好，给后面的人吃。原料怎么来呢？因为公社和公社之间的价值交换被打破了，因此城乡差别也没有了，郊外的土地里的菜和猪，都自动有人杀好、切好、摘好，自动就近送来。

2. 穿的方面，玲珑五色，男女服饰的差异极大缩小，基本上都是涤纶面料，棉布面料不要有了。

3. 用的方面，大致是原来的工厂解散后，留下几个万能机器，你要点什么东西，去看看有没有；没有的当场又造不出来的，写一张大字报贴在门口，请会做的人来做；要是看到机器需要的原料短少了，就近的人自动带一些矿石、再生利用能源放在万能机器的仓库里。会造某样东西的人相帮造出某项大字报上所需的东西后，写上注释，或当场向其他人解说。

4. 住的方面，原有的石库门以上等级的房子，凿去一些封建和资本主义内容的装饰后，继续可以用；新造的工人新村到了一定时候有了多余，加上家庭的取消，今天住到这里，明天住到那里，住个几天，用的东西自动消毒好，破掉的被子和日用品可以去万能机器那里自己制造或者领取。

5. 行的方面，脚踏车给小孩用，大人一律用三轮机动车，这样油料节省；老人因为吃了长生药，寿命不断延长，100岁开车也没有问题，1958年时候的中年人到那时候照样有力气劳动。火车自动化无人化，好像流水线一样在全国来回走，也不要钱，长距离旅行就靠火车。¹²

¹² 《大跃进时代领导们设想的2000年的上海》，《学习博览》，2011年第5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这份对上海市的未来规划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自动”与“万能机器”。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被理解为由万能机器自动地供给。当主事者在乐观地畅想“未来”时，却似乎忘记了自动化势必导致劳动者失业以及传统劳动形态的改变，而这本应是最能体现共产主义批判性和解放性的议题，在这份规划中却被毫无自觉地略过了。此外，这份规划中的“人们”面目模糊，“四个现代化”的愿景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的“人”的形态以及人群的相互关系与组织形态。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依然停留在依赖大字报的阶段，只是大字报不再服务于阶级斗争，而是服务于生产难题的解决。社会秩序如同机器般自动运转，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所有这些，不但距离当时的实际社会—经济条件较远，同时也很难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想象共产主义的“未来”并不容易。

192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论开始在中国知识界盛行。共产主义被叙述为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更高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奋斗的最终目标无疑是高度完美的，不过在实现怎样的共产主义以及如何具体实现共产主义等问题上，却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在很多情况下，“共产主义”一词的意涵是言人人殊的。同样是“共产主义”，既可以偏重生产力层面上的物质极大丰富，也可以指向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可参见毛泽东的相关论述），还可以理解为个体的自由、解放与充盈。与前述单纯追求物质丰富的庸俗乌托邦不同，同样是在1958年出现的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共

产主义畅想曲》便有着“不断革命”的紧张感。这篇连载于《中国青年》第22、23期的未完成之作试图描绘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在国庆三十周年（1979年）时的场景。在结尾处，小说中的白部长对小吴说：

小吴，别看进入共产主义了，任务还不轻哪。到处都这样。你瞧，生活美妙得像天堂那样，人们每天只上五个钟头班，晌午就回家，学习，打球，看戏，爱怎么过怎么过……可是劳动呢？严肃紧张的劳动一天也不能少，当然劳动条件是非常好了——但也不能幻想跟爱人一面散步一面就能完成任务。劳动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更复杂了。白天，都有成万人在劳动，在创造，在思考，在试验，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咱们国家推进到共产主义的更高的阶段。而且，还得向宇宙进军啦，飞向星星，飞向宇宙……——这就叫作不断革命……¹³

到了共产主义阶段，生活已经“美妙得像天堂那样”，但白部长强调的却是“任务不轻”、“劳动内容更复杂”，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咱们国家推进到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不过郑文光虽然注意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可是在他的笔下这种内在的高强度的紧张感最终也只能落实为不断提高生产力，所谓“不断

13 郑文光：《共产主义畅想曲》，《中国青年》，1958年第23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篇小说没有最终完成，郑文光解释说，这是因为与“大跃进”的设想相比，他的幻想算不上什么，于是便搁笔了。类似的现象，在当时还有不少。郭沫若就曾感慨，诗人的想象力已经赶不上“大跃进”的发展速度。

革命”并未触及生产关系和主体改造的层面。这样的未来书写实际上已经高度形而上学化了，失去了本应具有感召力和政治能量。那么，共产主义的“未来”只能如此书写吗？作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又应当怎样在文艺作品中具体化呢？如何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与主体状态跃然纸上？如何恰如其分地呈现出一个存在矛盾却依旧美好，可以对当下的人们发挥感召作用的共产主义“未来”呢？这一系列难题都有待回答。

多少带有悖论色彩的是，与其他“主义”一样，“共产主义”更多地是整体规划与理论预见，因而无法对实际展开的具体环节做出充分说明，这就使得在设想“共产主义”的具体图景时，会产生不少分歧。至此，就有必要在《共产主义畅想曲》之外再引入另一部1958年的科幻作品《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及其引发的“怎样展望共产主义的明天”的讨论，以期在当年的往复辩论中打开“未来”书写的某些细节与侧面。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剧作家田汉参观完十三陵工地后写下的多幕话剧，用来歌颂首都群众义务劳动的大协作精神。¹⁴该剧共十三幕，前十二幕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歌颂了劳动和人民群众，最后一幕则是幻想二十年后的十三陵水库。《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原名《十三陵水库歌功记》，后为了体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改为现名。该剧发表于《剧本》1958年8月号。同年，田汉与导演金山合作创作了同名电影剧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¹⁵电影版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表现。在论争中，打响

头炮的是朱艺祖的《怎样展望共产主义的明天？——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观后》一文：

关于“二十年后”的描写，舞台剧只是十三场戏的最后一场，是一场尾声性质的戏。影片则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二十年后的十三陵。改编者的愿意当然是想用美好幸福生活的远景来激励人们今天的干劲。但看完影片后，我却感到这一部分颇值得研究。

二十年后，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无疑的，至于二十年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确是不容易具体描绘的。这需要作家发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大胆地加以想象。我们无法争论作家对未来生活的某些细节描写是否准确，但是可以并且也应该判断那些想象里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是饱

14 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原本准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提前上马。十三陵水库兴建于1958年1月21日，主体工程于同年6月11日建成。这一工程原本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但由于采用了边勘测、边计划、边施工的“革命方法”，再加之首都群众齐心协力的义务劳动，于是仅用了一百六十余天便完成了主体部分。据《人民日报》1958年7月2日发表的社论《首都人民大跃进的标志》介绍：“4月份以后，平均每天有十万人参加义务劳动，其中有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工人和农民、商业工作人员、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因此，十三陵水库也被称作是一所共产主义的劳动大学，体现了共产主义相互支援、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的大协作精神，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

15 具体参见黎之彦：《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创作纪实》，《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8-129页。

满的还是稀薄的。¹⁶

朱艺祖点出了从话剧到电影的改动：作为尾声的未来想象在话剧中只有一幕的篇幅，而在电影中竟占据了三分之一时间。导演金山自述如此改动是为了用“未来美好生活的远景来鼓舞今天参加建设的人们”¹⁷。但朱艺祖认为在“鼓舞”之前，应当首先审视这个“远景”，考察其间蕴含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精神的饱满程度。共产主义远景无疑是抽象的，因此谁能具体准确地呈现出共产主义的神髓，谁便能掌握了“未来”的阐释权。朱艺祖经过一番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电影中的共产主义远景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终点，失去了更新“未来”的可能性。此外，他还指出了电影中最为人们诟病的一处细节：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十三陵水库里，主人公之一张静表示，偶尔挑挑扁担是为了锻炼身体。在当时广为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和矛盾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不只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循此标准，电影结尾处呈现的是一种享乐主义的“未来”想象——“幸福已经到顶了”、“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矛盾、斗争”，这反映了创作者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庸俗与片面的理解。朱艺祖认为不能仅靠未来的物质生活刺激当下的革命积极性，而是应当通过“描写人们永远昂扬的英雄主义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今天的人民。

接下来，在1958年第22期和第24期《文艺报》上连续刊载了以《怎样展望共产主义的明天——讨论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为主题的读者讨论。在讨论中，绝大多数观点与朱艺祖接近。例如，陈刚在《应该写出人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中指出，影片对原剧中激动人心的主要内容——群众忘我的劳动和昂扬的共产主义精神表现得不够充分有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剧的光辉。影片的主要缺点包括：（一）只介绍物质生活；（二）只表现在极乐世界的享受；（三）宣扬个人幸福的资产阶级趣味；（四）“也是最根本的，在‘远景’里，改编者没有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面貌，只是在介绍物质生活的舒适，好像开了一张幸福生活的‘清单’似的。这种反映是很片面的，可是文学艺术作品，应当更着重在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上”，“艺术作品主要是写人、写人的思想、精神品质，而不是主要写苹果、葡萄、电视机、传真对话电报等。另外，思想是可以超越在现实的前面的，我们要写作品中人物的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写的比现实中的人物的思想更成熟，更完美。”¹⁸

再如，丁浪的《畅想与人》指出技术成就是写不胜写，书不胜书的，很容易造成沉溺于物质的危险倾向。他认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等于共产主义。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没有写出共产主义的神髓与人的状态：“看不见二十年后的人对人类的命运是否关心？对做宇宙的主人有什么样的雄心？也看不见

16 朱艺祖：《怎样展望共产主义的明天？——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观后》，《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17 金山：《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拍摄》，《大众电影》，1958年第21期。

18 陈刚：《应该写出人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文艺报》，1958年第22期。

他们如何对待劳动，是否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看见的都是物质享受。尽管口头上也讲了劳动，但都是抽象的，物质享受却是具体的、形象的。这样不能说表现了人们没有忘记劳动或者对劳动更加需要。”¹⁹这一批评切中肯綮，但对精神的极大强调，势必带来书写上的挑战。如何写出不可见的“精神”，以及物质享受与物质追求在多大的限度内可以被视为是合理的，都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²⁰

还有，关越在《怎样评价〈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认为“以明日之生活，鼓舞今日之人民”并不难理解，但不能把全体人民所共有的美好前景与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混淆起来。他指出：“影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后一部分的根本缺陷是在于：改编者的主观世界没有跟上时代的飞跃，没有能抓住时代精神，它在描绘共产主义的时候，掺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颜料。”²¹关越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颜料”包括把劳动当作消遣，为了开宴会而任意停止刚刚开始的人工降雨，以及大夸女人的美色等。“资本主义的颜料”的提法很形象，它揭示出了不同社会性质的“未来”想象的界限：社会主义的未来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它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当时认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共产主义的“精神”，而在“物质”层面上是很难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在关于“物质”的理解、追求、应用和组织等方面，当时的理论界与批评界并没有提出另类的超越性方案。

当然，对于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并非只有否定意见，也有部分讨论者认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本就是共产主义的题中之

义，加以描写并无不妥。刘鸿仁的《问题在哪里？》²²和王绍猷的《不要吹毛求疵》²³都指出目前的批判过于严苛，对于美好物质生活的追求是正当的。不过，反对意见在这场讨论中显得十分边缘。因为彼时的主要焦虑是如何在未来远景中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通过保持劳动和斗争的核心驱动力，以保证共产主义未来的方向性和纯粹性。至于是否应当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其实并不存在多少分歧。

不过，在物质匮乏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里，越是强调共产主义的远景，往往就越容易导向对未来物质的丰裕程度的追求。比如，当时幻想的人造食物体积巨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叶永烈这样回顾：

我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在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当时在北京大学念书，连饭都吃不饱。而且我记得当时是教育部长到北大来视察的时候，我们多发了一个煮鸡蛋，那算加餐了，所以在那种年代，越是这样的情况，越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比如未来城的西瓜是什么样呢？非常大，切开以后有

19 丁浪：《畅想和人》，《文艺报》，1958年第22期。

20 在后革命时代，物质利益成为维系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主要动力所在，随之而来的，是物质利益对人的规定性越来越强。这虽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更为凸显的现象，但其与前一时期的连续性也值得关注。

21 关越：《怎样评价〈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文艺报》，1958年第24期。

22 刘鸿仁：《问题在哪里？》，《文艺报》，1958年第22期。

23 王绍猷：《不要吹毛求疵》，《文艺报》，1958年第24期。

圆台面那么大，三个孩子吃了半天才只吃了一个小坑；苹果像脸盆那么大，桔子就像那个西瓜那么大；还有原子笔，就是现在很普遍的水笔，是像胡萝卜一样粗的，有很多很多种颜色。²⁴

所以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满篇都是上述讨论中所批判的五光十色的物质“清单”，而原本致力于整合物质—技术发展逻辑与共产主义精神状态的张力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的未来市便是一个自动化、机械化与无冲突的样板。在这个科技乌托邦里，小虎子和小燕一家人就是“安琪儿”。小说里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方面和生产关系的描写，笔力全部集中在生产力的维度上。因此，“未来市”既是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未来书写的典型形态的极端化，又反映出了共产主义未来想象难以为继的困境——如若写不出“精神”，便将沉溺于“物质”；而越是沉溺于“物质”，共产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就越微弱。只不过到了《小灵通漫游未来》问世的时代语境中，物质发展的丰裕程度成为衡量共产主义实现程度的最主要的标准，物质与精神之间拉锯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不过，在这个“无冲突”的样板中，还是存在若干裂隙与矛盾。最典型的便是机器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机器人铁蛋相当于全家的仆人，成为自动化时代阶级压迫的另一种翻版。而在《小灵通再游未来》中，铁蛋虽然升级为高级机器人，却也只能按照主人的命令，从事各种杂务。到了《小灵通三游未来》，不平等关系更加赤裸。小虎子一家去空间站旅行时，本不想

带着机器人铁蛋，但因为空间站缺少打工的机器人，才允许铁蛋与他们同行，对此铁蛋感恩戴德：“愿意，愿意，一百个愿意。”²⁵到达空间站后，铁蛋没有自己的座位，只能站在卫生间里。而在空间站中，只有机器人劳动，人可以不劳动。小虎子一家进入梦乡后，铁蛋还要彻夜站岗。第二天，大家奖励了铁蛋一朵大红花：

铁蛋这时倒有点腼腆起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一个临时的‘打工妹’，能够让我免费上太空，我够满足了。”²⁶

在与小灵通交谈时，“铁蛋笑道：‘在未来市，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我们“钢铁”工人——我的“铁哥们”。’”²⁷铁蛋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自己从事的最累、最苦与最危险的工作。机器人虽不直接等同于人，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小说设想机器人可取代底层体力劳动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可问题是，机器化和自动化并不能一步到位，在此过程中，体力劳动（者）依然大量存在，并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越拉越大，这也是毛泽东时代要自觉克服的难题。而在《小灵通三游未来》中，机器人铁蛋自况为“打工妹”和“工人”，并在作为主人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做出种种“贬低”自己的言论，不

24 谢玲：《“小灵通的爸爸”叶永烈》，《阅读》，2014年第5期。

25 《小灵通三游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

26 同上，第181页。

27 同上，第210页。

由得让人反思科技进步过程中劳动、机器与人的关系。在小说呈现的思维方式下，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完全隔绝的，相比起科技发明和技术创造，体力劳动的价值直线下降。对于普通体力劳动者来说，自动化虽然可以减轻劳动的繁重程度，却也带来了新的压迫，亦即劳动力快速贬值，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事实上，就在《小灵通再游未来》与《小灵通三游未来》出版的1986年到2000年间，“打工妹”和“新工人”等进城务工群体身上发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已不容回避。如果细究，便会发现小灵通所畅游的未来市，是一座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都市想象为基本模型的城市。城市“自然而然”地成为未来技术的载体，农村则丧失了自身的未来。这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所致力消灭的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与性别差别等都不再是《小灵通漫游未来》所关切的对象。它以某种看似“超越”的方式实际上完成的却只是对问题的暂时“搁置”。它只负责提供万花筒般的“未来”拼图，却无力结构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全新的未来。

当然，指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要对一篇科幻作品求全责备，也不是要否定其在历史转折时期放射出的巨大能量。与其文本的单薄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其间反映出的带有普遍性且影响深远的思维方式，而且其中蕴含的未来观和发展观参与塑造了我们今日所处的现实。这也是本文引入从《共产主义畅想曲》到《小灵通三游未来》的讨论谱系的意图所在，在连续与断裂的纠缠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历史阶段的诉求与行动。《共产主义畅想曲》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都是在“畅想”未来，

而小灵通则是在“漫游”未来。“畅想”对应的是抽象的观念性的未来，而“漫游”则意味着具体经验的叠加和汇总。前者可能失之空洞，成为“政治正确”的注脚；后者容易无深度、平面化，丧失对于内在意义的追求。时至今日，《小灵通漫游未来》所呈现的科学幻想大多已变为现实，而且当下的中国人也不再会对科学技术轻易抱有当年那样乐观的信仰，这也就使得该作在今天丧失了吸引力，而只具有作为历史文献抑或怀旧的价值。

小灵通的“未来”在当下不过是已然实现的“过去”，新鲜感丧失后便了无可观。相反，倒是《共产主义畅想曲》中对“继续革命”的主张、关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论争中呈现的物质与精神的博弈，具有了某种“剩余物”的价值，并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被完全消解掉。这种“剩余物”的意义乃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叛逆与超越，是对于平等、自由和解放等终极难题的直面、回应与追求。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作品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并且大都陷入了形而上学化的“政治正确”当中。待到“文革”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些“剩余物”伴随着现实实践中的巨大挫折而变得游移模糊，自然也就在以《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新时期”初期主流的“未来”想象中没了踪迹。

三、用“未来”发明历史与现实

书写共产主义未来的分歧不仅在于达致怎样的“未来”，以及如何达致“未来”，也在于应当将“未来”编织进怎样的历史序列中。换言之，当“未来”成为人们的核心

关切，那么在不同的未来想象中，便会发明出不同的历史叙述，并影响到对于现实进路的选择。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和现实都需要通过与“未来”的合理关联来获得自身的位置与合法性。所以，关注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叙事与考察科幻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实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围绕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展开的“怎样展望共产主义的明天”的论争中，有人把影片中未来幻想部分里张静对扁担的喜爱称为“好古癖”，认为这样的怀旧情绪并不是认知历史的正确方式；共产主义者应当看到从扁担到起重机的“跃进”，要继续从机械化、自动化“跃进”到原子化。文章总结道：“一个共产主义者”是“必须这样明确的回顾和珍视过去”的，²⁸即把过去视为斗争与“跃进”的历史，并以此精神迈向更高的理想追求。

除去这一细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对于“历史”的展现还有更为直接的例证。在话剧版和电影版的开头，都有一段完整的历史叙述，通过回顾元世祖忽必烈与明成祖朱棣兴修水利的往事，来衬托新中国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历史进步性。前者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奴役，后者则呈现出人民群众义务参加劳动、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无上热情，由此形成一套历史进步的叙事。田汉的秘书黎之彦详细记述了田汉当年如此创作的意图：

田汉同志写的第一场，照他构思的意图，把戏剧总发展线写在指挥部，由政委向文化界慰问团介绍水库工程的建筑蓝图进程和未来设想，介绍工地上的群英战斗事迹，以此

让慰问团把戏剧线引向工地四面八方。戏的第一场，工地建设的概貌如凤头，既明确又秀丽。但田汉同志觉得戏太平了，于是他搁下了笔，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他让我找出《元史》和《明史》，翻阅忽必烈和明成祖的帝王本纪条目。他仔细地读着，用小纸片作出记号，夹在书里。他写作边看书边写，这是他的习惯。时近中午，他新设想的情节已经想好了。他指着《元史》说：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北京的通惠河经常发生水灾。忽必烈曾经令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开通惠河。据《元史》载，郭守敬“精算术，明水利”，曾受元世祖召见，陈述治理水利六事，授提举诸路河渠。他在昌平治水时，在至元28年，元世祖还亲自拿锄头、土筐参加劳动，宰相以下大臣，也都跟着他去。这就是史载的世祖“亲操畚耜为之倡”。晚上田汉同志果然把这段历史插进第一场，让戏今古衔接，有波澜。他说他写这一笔，加添点历史色彩，一则是兼顾历史真实，二是造成对比度，说明元世祖和我们今天领袖们带头倡导劳动，在本质上不同。他说：“我在戏里安排历史家简幼岑，也就是翦老翦伯赞和音乐家李翼、副总工程师的对话中，就让他们争论，说元世祖令大臣们劳动是做假样子的，不能跟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参加劳动相比。在精神实质上完全两样，参加的劳动者精神状态更不相同了。元世祖下令开河的是军队、奴隶，全是被动的，没有热情的。比起今天，完全不同，我们的人民，完全是自觉的劳动，迸发的是冲天热情和干劲。还有在建设规模，使用目

28 梁鸿：《明天的人将是争取美好未来的人》，《文艺报》，1958年第24期。

的上，建设水库更是悬殊，简直是天壤之别。”田老说至此，颇有把握地说：“写足了这场辩论，这个古代场面的穿插，在政治上就站得稳当了。”²⁹

“辩论”是追问事物本质的一种方式。通过古今历史的对比，《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贯彻了用阶级斗争的观念与方式把握历史的努力。这种“革命史”的历史认知逻辑在后革命的语境中逐渐式微，这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及其续作中便有明显表现。有意思的是，小灵通系列文本里也都有着大篇幅的关于未来市的历史介绍。将其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的历史叙述加以对照，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里，小灵通前往未来市图书馆里查阅《未来市的历史》一书，该书由机器人拿给了小灵通：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了这本大书，第一页上写着这么一句题词：

“地球上本来没有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我连忙拿出采访笔记本，一字不漏地抄下了这句话。

在第二页上，画着一张蓝色的地图。旁边写着：

“十几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到处都是水，水，水……”

在第三页上，画着一张黄色的地图。旁边写着：

“一万多年前，由于地壳的变动，海底逐渐升高，这里变成了一片沙漠，到处都是沙，沙，沙……”

在第四页上，仍是一张黄色的地图，

上面出现几条蓝道道——河流，和几个绿点——草地。旁边写着：

“一千多年前，古代劳动人民向这里进军，向大自然宣战，用双手挖出了渠道，引来了河水，沙漠上出现了稀疏的绿洲，人们在这里开始耕作、牧羊……”

在第五页上，地图上绿色逐渐增多，还出现红色的线条——公路，黑白相间的线条——铁路和蓝色的虚线——飞机航线。旁边写着：

“一百多年前，人们用智慧和劳动，不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使干旱的沙漠变成了良田，人们战胜了大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主人，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第六页上，地图已经是一片绿色了，公路、铁路、飞机航线密如蛛网，还出现了宇宙航线。旁边写着：

“这是现在的未来市地图，这张地图是用劳动的双手画出来的，是经过艰苦的斗争才画成的。”

在第七页上，是一张空白的地图。旁边写着：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万年、十亿年后……未来市将变成怎样？这最新最美的图画，是靠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去绘制，也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把它建设得更美丽，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从第八页开始，全是白纸，一个字也没有，甚至连书角的页码也没有。³⁰

29 黎之彦：《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创作纪实》，《田汉创作侧记》，第120-12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0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第53-5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有意设计的革命史的“波澜”不同，未来市的历史被叙述为人民不断开发和利用地球的历史，亦即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人类改造地球的历史既没有起点（“本没有路”），也没有终点（未来还是一张“白纸”，迈向无限进步）。在《小灵通再游未来》里，小灵通与小虎子、小燕、机器人铁蛋乘坐着新兴交通工具“五用车”参观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是他此行的最后一站。博物馆里的历史画廊由化石、标本、模型、实物、图片、照片与机器等组成，长达数公里，分为“上游”（过去）、“中游”（现在）和“下游”（未来）三部分。“再游”的历史叙述从地球诞生开始说起，一直讲到当下的人类文明，历史分期的界标多为重大的技术发明（比如铁器、蒸汽、电脑与机器人等）。“共产主义”不再作为最终的远景目标而存在，支配未来远景的，只有生产力水平。而这显然正是一种以“唯科学主义”为载体的对“现代化”史观的机械理解。

同样地，在《小灵通三游未来》中，小灵通采访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去未来市美术馆参观“未来市少年儿童未来书法展”。书法展的主题是“未来”，书写的内容都是关于未来的诗词、名人名言或者书写者自己的观点。一如小灵通所言：“我竟然完全沉醉于条幅本身关于‘未来’的哲言，忘了这是书法展览”³¹，整部小说的重点也在抒写未来观与时间感。在参观展览时，小灵通最先关注到的是李大钊的一段话：

无限的“过去”都是以“现在”为归宿，
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

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³²

李大钊强调过去与未来的“无限性”，将历史理解为连续发展的无限进步的序列，这样一种典型的进化论叙事，无疑恰与七八十年代之交大多数中国人的未来观高度契合。当然，此中也预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热衷于无限进步的趋向。对此，历史学家王汎森总结道，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改造中国，进而通向“未来”的整体方案。李大钊持有的是一种“跃进”的进步观念，而不是一点一滴改变的“进化”观念。相形之下，胡适认为不应当对无限的未来过于迷恋，否则容易陷入到“目的热”与“方法盲”的境地中去³³。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写道：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

31 叶永烈：《小灵通三游未来》，见《小灵通漫游未来》，第229页。

32 同上，第228页。李大钊语出自《“今”》，《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

33 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77-306页。

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即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³⁴

胡适的批评揭示了20世纪中国历史感与时间感变迁的某个侧面。在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前，历史一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三代之治”而非遥远的“未来”，才是应当追求的“黄金时代”。而在进化论传入之后，“未来”才成为中国人的核心关切。“过去”通过“现在”朝向“未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进步主义史观。而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扎根，结合了辩证法思想之后的进化论更为强调人对于客观进化规律的超越。这就带来具体实践上的重大分歧：迈向“未来”究竟是经由“一点一滴的变异”，还是“一蹴即到”？是遵循“进化”规律逐步抵达，还是依靠“跃进”加速实现？从1920年代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再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核心议题始终贯穿其间，甚至构成了理解与省思20世纪中国的一条主线。小灵通系列文本畅销于“文革”结束之后，但却沿袭了此前一个时期对于“未来”的急迫渴求与乐观信念，共享了对于无限进步的历史观与时间感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中国依旧是以某种“跃进”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未来”，只不过“新时期”的“跃进”更加依靠对于客观规律的重视和科学技术的作用，而非人的主观能动性。这

一调整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思路与方法，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

本文重新考察改革开放之初风行一时的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意在通过对这一文本的症候性分析，彰显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内部想象与书写“未来”的断裂和连续。经过对前后两个时段的时间观、未来观与历史观的参照和反思，希望藉此发现与省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若干困境与难题，包括如何看待物质需求与物质享受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如何处理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的价值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物质丰富与精神上的“不断革命”的张力，如何将越来越重要的科学技术纳入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规划与解放进程中，以及如何将无限进步的欲求妥善地结构到现实世界的组织秩序中，等等。从今日再度回望小灵通漫游的“未来”，便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生活在当初期待的美好世界当中，过度追求科技进步和物质享受，并以生产力水平作为唯一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做法，已经导致了诸多新的严峻问题。而讨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重新进入这七万余字“制造”出的“未来”中，考察其从何处而来，又怎样展开，既可以追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更可以映照当下的现实。

3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8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